



□李 爽 赵连稳

在清代的天津书院中，问津书院是创办最早、办学时间最长、建筑规模最大的书院，以名师荟萃、开风气之先而闻名，人们将其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广州的学海堂与广雅书院、保定的莲池书院等著名书院相提并论，奠定了其在清代特别是晚清教育界的重要地位，是天津教育史上颇具特色的书院。

问津书院位于天津城内鼓楼南，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由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卢见曾创办，是天津城历史最悠久的一所书院。卢见曾到天津上任后，便萌生兴建书院的想法。这时，长芦盐商查为义对卢见曾说，他家有一处废宅，位于长芦盐运使司衙门的西南角，愿意捐献出来用于建造书院。于是，卢见曾在报请直隶总督方观承批准后、召集众商出资捐建，建成后的书院有讲堂3间，直隶学政钱陈群为其题名为“学海”，前为大门，后为山长的书房，周围被学舍所环绕，共计房屋60多间，其规模在天津书院中屈指可数。书院建成后，卢见曾将其命名为“问津”，取“汎海问津”之意，鼓励生徒们在知识的海洋里，扬帆起航，探求知识。

讲授经世之学

问津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讲授经世致用之学，并在光绪年间专门设立了学海堂，较早开设了经古课。清末，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和洋务运动的重镇，书院讲学又增加了时务和西学内容。

问津书院讲授经世致用之学，这和该院山长（书院院长）的思想密切相关。问津书院第二任山长姚范，长于考据，但又重视传统理学。他认为汉学、宋学两者都有可取之处，亦均有偏颇，应取其所长，因此问津书院讲学内容以经古



课程为主，又兼有传统理学。

问津书院经古课程的内容主要为经义和史论，前者是对儒家经典的释义，后者是评述史事和人物，另外还有诗古文词。莲池书院山长黄彭年的儿子黄国瑾担任问津书院山长时，借鉴莲池书院的做法，仿照广州学海堂的章程，制定规条，完善问津书院经古课。在他前后的山长如张佩纶、李慈铭，均倡导“以经义、史论及诗古文词课士”。

有个故事颇能说明问津书院的讲学内容。清制，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期满后，经考试优等者，授以翰林院正式职官，名为留馆。光绪十年（1884），被后人誉为“南开之父”的严修，为了留馆考试，向张佩纶请教如何备考。张佩纶告诉他，考据之学虽通经，但不足以致用，经学因以小学入手，故小学不可不讲。读史则以“前四史”为要，若能读过《资治通鉴》、四史、《明史》，则为“斐然博雅之人”。这则故事反映了张佩纶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也是问津书院的讲学内容。

汇聚名儒讲学

清代众多著名学者如吴联珠、姚范、金文淳、廉兆纶、李嘉端、张佩纶、黄国瑾、李慈铭、汪宝树、叶昌炽等文化名家，均曾主讲于问津书院，他们的为人为学薪火相传，留下了很多佳话。

李嘉端，号铁梅，道光九年（1829）二甲第三名，学问大、人品好，人呼“铁大人”。自同治九年（1870）被学生李鸿章聘请为山长后，至光绪六年（1880）去世，主持问津书院十年。他讲课极为认真，有人劝他不必太过用心，他说，“讲席之位，风气所关，若草草了事，必致貽误众生”，临终前夕，“犹对客谈文，客去后书记数行，遂无疾而逝”。

张佩纶，字幼樵，同治十年（1871）进士，清正廉明，为人正直。光绪七年（1881），担任问津书院山长，严修成为他的门生，在问津书院课业，翌年，严修中举，第三年成进士。严修后来对人说，我能有今天的长进，没有老师的“督责之力不及此”。光绪八年（1882）冬，张佩纶给李鸿章写信，推荐自己的密友、翰林院编修黄国瑾接任山长一职。自光绪九年（1883）开始，张佩纶便不再就任了，但他在寓居天津的多年间，仍然和问津书院生徒常有来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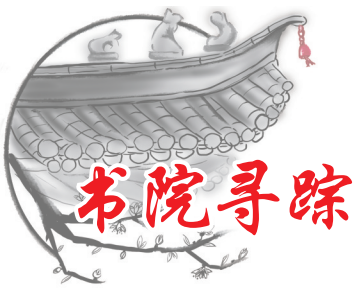
李慈铭，字爱伯，光绪六年（1880）进士，学识渊博，为帝师翁同龢器重，是和王闿运、俞樾等硕儒齐名的书院山长。他兢兢业业，对学生的课业尽职尽责，在他撰写的《越缦堂日记》有这样的记载，“阅经古卷团……为卷卷细评，稍可取者改润之，余亦多加勾乙”，“竟日评改问津诸生课卷，近年心力疲于此矣”。李慈铭批改生

徒课卷十分用心，因此赢得了众多生徒的爱戴。

转变士人风气

天津的近代化进程中，离不开世风的进化，世风的进化离不开士人风气的转变，而书院教育就对士人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载：“光绪以来，文风日盛，得书院观摩之力居多。”在问津书院开设经古课之前，天津书院“晨夕讲求者，功令文字而已”，经古课设立后，一些书院也随后跟进，如稽古书院，其课程仿问津，专课经古。而李鸿章为客籍子弟而设的集贤书院，也讲授经古课程，使天津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八股文，倡导经世之风。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晚清天津成长为北方近代化程度较高城市的过程中，包括问津书院在内的书院确实功不可没。

到了清末，问津书院又吸收西学知识、将西学纳入考课内容，于是培养出许多“渊懿博雅之材”，如严修、陈骥、陶喆牲、杨凤藻、林墨青、王春瀛、高凌雯、陈宝泉等众多教育人才，正如天津知府马绳武所说，天津“数十年来，科第之胜，甲于他邦，大抵得力于书院居多”。问津书院培养的很多人才成为了清末民初时期天津学界的重要人物，对新学在天津地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发挥科技名人档案的社会化服务功能

□ 汪长明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指出，要高度重视“人民科学家”等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的精神宣传，大力表彰科技界的民族英雄和国家脊梁。加强科技名人档案采集、整理、研究和传播，深入揭示广大科技名人身上折射的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标志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既体现了对科学与科学家的双重尊重，有利于科学家精神社会价值的应然回归，又为引导广大大学生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和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了现实参照，还为激励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潜心科研、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资源保障和典范引领。充分发挥科技名人档案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供历史镜鉴。爱国和创新是科学家的根本坚守，也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涵。档案无声胜有声，让尘封的科技名人档案触手可及、走近公众，让鲜活的科技名人故事触及人心、走进时代，既赋予档案以新的生命，又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提供了新的精神力量。一封钱学森的回国求援信，倾注着一位留美青年

科学家“冲破藩篱归故国”的赤胆忠心；一份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体现了他卓尔不群的科学智慧和战略视野，成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之作。而另一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牺牲时留下的那个装有原子弹研制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则诠释着他用生命守护科学事业、用热血捍卫国家使命的壮烈情怀……发生在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如此种种感人肺腑的故事见诸档案、传诸后世，它们既是科学家本人人生历程的直接“信物”，也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缩影和时代进步的历史镜像，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为推进科技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思想支撑。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接力创新，谱写了共和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宏伟篇章。科技名人档案是科技名人学术成长、创新实践和科学活动的真实记录，承载着科学家的科学历程、思想轨迹和价值情怀，蕴含着永不磨灭的科学文化。而对已故科学家而言，他们留给世人的科学遗存在某种意义上称得上是他们“科学生命”的延续，成为其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服务社会的物质载体和精神符号。正因如此，科技名人档案的价值生命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价值力，可以激发和培育勇

于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创新的社会氛围，为科学传承与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科技强国战略提供宝贵的思想支撑。

为科学家精神传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提供价值引领。《意见》提出，要大力弘扬广大科技工作者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和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科技名人档案是科学家“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把人生理想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的物质载体，蕴含着他们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特质的科学家精神的重要“物证”，是弘扬科学家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的生动样本和经典教材，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为立德树人及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者和接班人架设精神支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等各环节。科技名人档案既是文化知识教育的厚重教材，也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有益读本，增强科技名人档案面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功能，对在校大学生而言，可以增强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报效祖国远大理想信念的塑造，在实践上可以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提供新的突破口；对在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而言，可以引导和激励他们在教学科研工作中自觉履行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应有力量。

当前，科学家档案主要留存存在档案行政管理单位、科研机构的档案编研部门和档案文博场馆，对社会而言还是处于相对被动服务的状态。我们要通过大力加强以科学家为主的科技名人纪念馆建设，充分发挥其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科学内涵，促进科学文化繁荣发展。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标志性人物灿若星辰，当我们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对中国的清官群体进行致敬时，“包拯”这个名字都是家喻户晓，非常具有代表性。包拯的清廉与刚正，从家乡庐州（合肥）到天长、端州、池州、开封等地，他在每一处都留下脍炙人口的传奇事迹，并被后人改编为小说、戏剧，深受民间推崇，在后世被广为称颂。

千百年来，对包拯做过研究的学者数不胜数，但大多论述他为官之后的历史和故事。每个人一生的轨迹，往往在其年少时期便已有端倪。包拯生在合肥，成长在合肥，从考中进士，到为尽孝父母十年不仕，再到出仕为官走上政治舞台，可以说，他的忠君为国爱民思想的“初心”，是在家乡合肥所形成。所以，要更进一步深入研读包拯，就要追寻包拯早年在家乡合肥的岁月。

清白家传远。夏日荷花之所以别样红，自有深埋于水下的根茎及水土的养育熏陶之情。合肥地处江淮分水岭，古称合肥、庐州。“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合肥人视野开阔、求真务实的品格特质，《全唐文》中评价“人心刚而风土劲”。当然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里是包拯的故乡。目前合肥包拯的遗存主要集中在市内的包公园和肥东县境内的包公镇。

包拯始祖为春秋晚期楚臣申包胥，父亲包令仪曾任惠安知县等职。包拯999年出生于今合肥肥东县包公镇小李蛮村。小李蛮村东、南、北三面环山，峰叠叠嶂。包拯古宅虽已不存，但尚有东西并列相距百米的花园井和荷花塘。花园井建于后周显德年间。包家世代以耕读传家，包拯祖父是私塾先生，为接济贫民，将自家井水供全村使用，并免费让周边穷人家孩子上自己的私塾，这给幼年的包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荷花塘又名清明塘、清净塘，是包拯之父包令仪所修建。千余年来，塘榭杨柳依依，塘中莲藕雪白，生生不息。村东和东南还有包拯常去游玩的凤凰山和虎山，那里“苍松青翠，怪石鳞毗”。在此度过童年的包拯，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和地方文化熏陶，一股报效朝廷、为国为民的大志在心中油然而生。

勤学香花墩。包公祠作为合肥市内包公园的主体建筑，位于包河上的一处小洲。此洲名叫香花墩，是包拯青少年读书之地。据《庐州府志》记载：“香花墩，在合肥县南城外壕水中，孝肃公读书处。”香花墩四面环水，澄清见底，游鱼三三两两，历历可数，莲荷盈盈，绿树掩映，环境清静幽美。包拯自小勤奋好学，北宋官员吴奎在《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公公墓铭》中称包拯青少年时即“挺然若成人，不为戏弄，长驱厉操守”。青少年时期的包拯博览经史之书，“喜读书，无所不览”。包拯自己在中年回顾说，他早年“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实素守，期以勉循”。青少年时期的包拯，十分注意砥砺自己的思想节操，立志做一个志趣和情操高尚、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在其一生中，也充分实践了这种政治理念。

有缘遇名师。在庐州求学的包拯，遇到了一位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刘筠。刘筠为著名学者，曾参与编纂大型历史图籍《册府元龟》，在文辞和诗歌方面 also 颇有名声，被人“推为精敏”。刘筠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宋史》载：“性不苟合，遇事明达，而其治尚简严。”因权臣当道，1021年，刘筠以右谏议大夫任庐州知州。在庐州期间，品学兼优的包拯深得刘筠赏识，包拯也将其引为伯乐。《宋史》载：“包拯少时，颇为筠所知。”两人遂成忘年之交。得到刘筠亲传的包拯，学业也是日渐进步，名声渐显。包拯作为庐州地方一个“生于草茅”的学生能够闻名全国，刘筠这样一位文坛领袖的提携、赏识并言传身教，对其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坚贞不阿的政治节操方面，对包拯的仕途走向乃至一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孝道之楷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出仕之前，包拯将养老孝老落到实处。包拯考中举人时，朝廷授予他大理评事，派遣担任建昌知县。但包拯父母已老，乐处乡里，包拯为尽孝道辞而不仕。后朝廷又委派他任和州监税官。和州与庐州毗邻，但是包拯父母还是“犹不乐行”，不愿离开家乡。包拯就解官回乡，一心一意侍养双亲。“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守丧期间包拯身心憔悴、紧衣缩食又坚持了三年。“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从中举得官，到辞官养亲，再到出仕为



□贾 猛

官，前后十年。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记述包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难能可贵。1038年，39岁的包拯完成对父母的尽孝，带着成为国之栋梁、为民造福、留名史册的决心，告别家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刚正知庐州。1053年，包拯独子包绂病故。经历丧子之痛的包拯，请求朝廷希望在家乡附近任职。朝廷体谅他的心情，先任命他知扬州，未到任随即改任庐州知州。“家乡官难做”。包拯回到家乡做官，自然会产生一些问题，一些亲朋故旧依旧仗包拯是地方长官，趁机横行乡里。《涑水记闻》记述：“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拊之，自是亲旧皆屏息。”从舅犯法，仍然依法受到惩处，包拯的刚正无私、不庇亲旧，为自己赢得了声誉。时至今日，合肥地区仍流传着“外甥有理打得舅”这样一句话。包拯任职庐州两年，为家乡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如免除杂税、兴修水利、赈济灾民等，现今保存在合肥包公祠内的“廉泉”，传说即包拯为解决庐州府学师生用水困难而开凿的水井。

出仕之前的包拯，忠君为国爱民思想已基本形成，为官期间的包拯以正直敢言、不畏强权、廉洁奉公闻名于世。他晚年立下家训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上世纪70年代合肥包拯家族墓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葬中并无贵重遗物，用事实证明了这种要求得到了贯彻执行。包拯的行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千年以后，包拯在家乡的遗存以及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与青山绿水共春秋。

